

0409

333

兴县文史资料

政协兴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第 一 期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日



目 录

“五四运动”对兴县的影响.....	贾维桢 (1)
抗战前兴县的几种地租.....	樊润德 (8)
兴县名老中医张尊五.....	贾佩珍 (1 0)
绥德《台、一九》起人回忆.....	赵连荣 (1 5)

“五四运动”对兴县的影响

兴县政协 贾维桢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是我国人民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政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运动中提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科学与民主”等口号响彻云霄，震动全国。兴县虽僻处山区，信息迟缓，但同样受到很大的影响，在“五四运动”革命思想影响下，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兴县也在不断前进。直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兴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兴县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都和“五四”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我们从“五四”以来兴县发生的许多事件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一、废读经，提倡新文化。辛亥革命后，虽然废除了八股取士，普遍改设学校，但学校里（包括初、高级小学），教师大部分是老秀才，课程在小学仍是读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之类；在高小以“经学”为主课，读的是《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之类。“五四运动”以后，取消了“经学”课，改为国文课，课程方面，也先后设置了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等科，以语文、算术为主科。小学里也采用了通俗课本。

1921年以后，高小国文课里增加了一部分语体文。师资队伍也有了变化，一部分从太原各校（包括大学、师范、中学）毕业的学生，被聘来兴任教的教师，日渐增多，其中特别任光春、刘献君、

白日增、白玉金、康联珠、温国钧、齐殿选以及稍后的中学教师常裕仁、梁崇秀等人思想进步，输入了新文化、新思潮，他们提倡白话文，提倡国语，提倡科学，教注音字母，指导学生唱歌、游戏并出演有革命意义的节目。提倡课外阅读，课外读物也逐渐丰富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的作品以及《国语月刊》、《新青年》、《黄浦周刊》均先后传入学校。从此学校被新文化、新思潮所笼罩，学校出现了新气象，学生学习的知识广泛了，学生思想眼界开阔了。

二、冲破牢笼，走出社会。“五四”运动前，学生被禁锢在学校读死书，学生“私出校门，记大过一次”，校门上挂着“学校重地，闲人免进”的牌子，真是成了“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囚徒。而且学生随时受到体罚。除了在校死读书以外与社会隔绝。根本没有权利过问国家大事。“五四运动”以后，情况大变。在“五四运动”期间，学校师生也闻风响应，他们开会宣传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收复山东半岛主权，严惩卖国贼，抵制日货，学生胸前佩带“抵制日货”的徽章。人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痛恨切齿。当时各学校流传的一首歌词：“东方岛国，日本倭奴，心如毒蛇窝。甲午以后，屡屡欺我，似童好吃果。既割台湾，又占旅大，更袭山东土。若不回头，中国成印度”。连小学生都会唱这首歌。民情的激昂慷慨，于此可见一斑。

三、打偶像，破除迷信。“五四”以前兴县人民受迷信思想、封建礼教的束缚非常严重。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逐渐提高，认识到封建迷信的欺骗性，打神象，移风易俗的行动也随之而出现。就如“五四运动”后不久，兴县第二高小校长牛友兰

先生为了建筑校舍，亲自动手砸毁了黑峪口无量庙的神象，适遇是年他家里因瘟疫死了几口人，一部分落后群众造谣说，这是砸神象的报应，而牛友兰不为所动，坚持破除迷信不疑。1925年兴县中学成立，择定城关最大的一个寺庙——寿圣寺为校址，他又带领学生砸毁了神象建成校舍，一时受到好评。又如刘少白先生在黑峪口家乡埋葬母亲时，取消了穿白戴孝遗俗，改为佩带黑纱、白花、祭文一破陈词滥调，改用白话文体，真情实感，妇孺皆懂，被群众称赞为“文明丧礼”。现在看来，他们这些行动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当时黑暗的封建社会里，他们接受了“五四”科学民主及新文化运动的先进思想，敢于向封建迷信思想挑战，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四、兴办教育，提倡女学，成立兴县中学。辛亥革命时期兴县一批留省学生如刘少白、牛友兰、牛映台、贾克明、温祺铭、邢肇迁、孙良臣等人在太原曾参加推翻满清巡抚陆鍾琦的斗争，他们是兴县第一批剪了辫子的人，他们都具有民主革命思想。回兴后他们都为创建民国、振兴中华做了许多除旧布新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兴办教育，他们认识到要使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端赖人才，人才的培养，必须依靠学校。他们不失为有识之士。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在民国初年创办了两所高小学校，一所女学校，四、五十所初级小学校。“五四”以后，他们接受了“科学与民主”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对兴办教育事业更加积极主动了，不仅学校数量也增加了，教学内容也注入了新的成份。小学发展到一百零一所，高小创办了四所，并宣传男女平等，女子和男子一样有受教育的权利，城关成立一处女子两级小学，黑峪口二高支校实行男女合校，有些大村小

学也实行男女合校。在此基础上，他们于1925年7月间创办了一所中学校——兴县县立初级中学校，这在当时的晋西北是一个创举。它是在“五四”思想影响下产生的，是“五四”思想在兴县发展的丰硕成果。这个学校一开始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创办的目的是为振兴中华，改变地方落后面貌而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教师大部是接受了“五四运动”思想的中年教育工作者，思想进步，具有科学知识，对学生有直接影响；学生一般年龄较大，都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渴求真理的愿望。因此这个学校的学生除在校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外，他们都能随着形势的发展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各种活动里都是卓有成效的，受到社会的好评。这个学校虽然仅仅存在了十一个年头，办了八个班和附设乡村师范两个班，高小一个班，培养了学生三百余人，但它给抗日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后备力量，这点功绩是不能埋没的。

五、响应北伐，捣毁国民党县党部。兴县人民和兴中师生对北洋军阀勾结外国帝国主义，连年内战是深恶痛绝的；对孙中山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并积极组织力量进行北伐，都是竭诚拥护的。1926年春，听到北伐战争胜利的消息，学生和广大群众异常高兴，奔走相告，全城欢腾，并由兴中师生发起，召集兴县城关机关、学校和居民开了盛大的庆祝大会、游行、宣传，标语传单充满街头。同时通过《黄浦周刊》以及其他进步报刊上的文章，也了解到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也初步知道，北伐所以迅速取得胜利是国共合作的结果。特别听到汀泗桥、叶挺打败吴佩孚，叶挺将军成了传奇式的英雄，贺龙的铁军也驰名中外，他们都受到青年学生敬

佩。正在人们积极响应北伐，渴望北伐军挥师北上，攻克京、津，统一全国的时候，又听到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共产党，进行“清党”，紧接着宣布开除毛泽东、林祖涵、吴玉章等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委员职务，打倒徐谦、邓演达等一类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蒋介石的这些反动措施，是不得人心的，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特别青年学生的强烈不满。尽管当时人们没有接触过共产党，对共产党不了解，但他们是认识真理的，他们始终认识到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是正义的，只有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取得胜利。所以他们是坚决拥护团结北伐，坚决反对分裂、甚至屠杀自己朋友的罪恶行为的。

1928年秋国民党正式在兴县登记党员，1929年国民党在兴县正式成立县党部，这个县党部秉承他们主子的意旨，在兴县倒行逆施，时间虽短，做了许多坏事，引起群众的反对，革命的三民主义他们不宣传，而到处叫嚣“清党”、“反共”，他们特别仇视思想进步具有正义感的兴中师生，在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情况下，于1929年春兴中师生联合各机关代表，一举查封了国民党县党部，把国民党人驱逐出境；1931年他们卷土重来，是年12月兴中早期毕业的留省学生贾维桢等回县，联合兴中师生和机关代表第二次查封了国民党县党部，从此兴县再没有国民党的活动。以兴中为首的兴县各界两次捣毁国民党县党部，在兴县影响很大，兴县人民和广大青年学生，对国民党无不表示唾弃。这也为后来共产党在兴县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六、“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九一八”事变，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把我东北三省大好山河拱手送给日本侵略者，全国群情激怒、义愤填膺，兴县也不例外。事变发

生，以兴县中学师生为首即召开了群众大会，声讨日寇暴行，电请国民党政府出兵收复失地。此后抗日救亡宣传不断扩大深入，使家喻户晓，同仇敌愾。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坚持内战的反动政策，人民群众特别青年学生坚决反对。红军东渡抗日给兴县人民留下良好印象，更加鼓舞了抗日救亡的信心。1936年山西抗日群众组织——牺盟会、动委会先后成立，芦沟桥事变后分赴各县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兴县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以及人民群众积极响应，特别兴中历届毕业学生和留省学生大部分参加了牺盟会、动委会工作，并成为骨干力量，成了抗日急先锋。就如山西牺盟总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牛荫冠同志，他是兴中早期毕业生，后考入北京清华大学，是共产党在清华大学支部负责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作过巨大贡献，建国后又担任国家领导工作。刘亚雄同志是兴县最早的女学生，也是兴县妇女中唯一的留苏学生，早期参加共产党，为革命出生入死，抗战时期也是老区杰出的妇女领袖，建国后一直在中央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原兴县教师刘献君同志思想进步，抗战初即参加牺盟会工作，历任老区县长、专员，建国后担任省级领导干部。其他兴中历届毕业生如贾维桢、孙启民、范瑞藻、武丕功、康明玉、魏进德、牛联棠、牛联棣、郭佩兰、杨桂根、裴壁、杨再清、张立、牛何之、牛在芬、牛荫潭、康廷献、康荣旺、刘武雄、王直、王芝田、王镇东、裴绍晋、温国光、刘念晏、孙启晏、刘福音等也都积极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分赴各地，大部担任了省、地领导工作。特别当时有曾由兴中毕业或肄业的一批留省学生，如裴绍晋、王力波、王直、康明玉、牛联棠、牛联棣、康锐、康振仪（方彦）、郭佩兰、康少钧等，他们有的在太原

已参加了牺盟会，回兴后协助县牺盟会直接参加了牺盟动委会工作，深入到基层，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使全县抗日救亡的浪潮迅速高涨，革命势力迅速壮大，为开展抗日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更重要的是，抗日战争开始有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知识青年的思想认识不断提高，全县人民明确了奋斗目标，使他们沿着党的正确路线茁壮成长。他们坚定不移地与新军、八路军团结一致向日本侵略者展开不调和的斗争，并战胜了顽固派的分裂活动，从而建立了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1940年新政权建立，在极其艰苦的岁月里，兴县党政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了重重困难。大批的战士奔赴抗日前线；大批的干部如雨后春笋地成长起来；大批的粮食物资源源不断地供应了前方。而且军民团结如一人，粉碎了日寇的不断的残酷扫荡，巩固了根据地。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以至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取得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我们回顾兴县人民包括知识青年在内，走过的战斗历程，认识到兴县之所以成为革命根据地，所以能够战胜敌人，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不是偶然的，而是从“五四”以来兴县人民长期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艰苦奋斗，不惜牺牲一切，而取得的。

回忆往事，源远流长，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当今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阶段，目标的宏伟，任务的艰巨，空前未有。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发扬“五四”以来的革命精神，继承无数先烈以及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强国，团结奋斗，再展宏图。

抗战前兴县的几种地租

县党史办 樊润德

抗战以前，兴县的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是残酷的。就当时流行的地租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是巨额地租，也叫实物地租。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定期向地主交纳一定数量的租子。实物地租的种类很多，有的叫“死租”：地主出租土地时，规定每亩应交多少租子，不论丰年灾年，必须如数交纳；有的叫“活租”。地主出租土地时，不规定租额，等庄稼成熟时，看庄稼的长势定租。一般是地主说多少，农民必须交多少；有的叫“分租”。地主出租土地时，规定农民按一年的收获量折成交租：有的是对半，有的是四六，有的是三七。不论采取什么办法，大部分粮食都被地主掠夺去了。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到头来还得饿肚子。

第二种是货币地租，通长叫“钱租”。农民种地主的地，地主向农民要一定的租子，按谷物折款交纳。采用这种不固定的货币地租，可以随时根据有利于地主的条件变为实物地租。有的采用“押租”；在出租土地时，强迫农民交纳一部分租金；有的是采取“现租”，也所谓探租，农民租种地，第一年交租，第二年种地；有的采取“伙种地”：地主出土地、种子、耕畜；农民出劳力，收获按四六或三七分成，地主拿多一半。

第三是额外地租。地主为了榨取农民的血汗，采取种种花招，

向农民掠夺额外收入。其办法：一是“虚田实租”，即地主出租土地时，一块地本来是八亩，硬说是十亩，提高租额；二是“大进小出”。收租时用大斗大秤，给农民借粮时用小斗、小秤；三是“送礼”。每逢过年过节，或遇地主的婚丧大事，佃户要给地主送蔬菜、鲜蛋、猪羊肉和其它土特产品；四是“写山开荒”。这种办法一般流行于靠山地区，山林被地主霸占，农民要开荒，予先得交纳垦荒费；五是“畜租”。农民使用地主的役畜，把役畜作价扣本，死亡以后全部赔偿，如生下幼畜四六或二八分成；六是“伙租”。一般用于租牧地主的羊群，事先把羊折价，规定生羔、剪毛、积肥数量和提成的办法。遇到丰收年，百分之八十的收入归地主，遇到灾年牲畜跌价或死亡，原价不变。发生亏损，由农民借债偿还。

第四种是高利贷。高利贷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劳动人民要生存，首先要有立足之地，糊口之米。有些穷人为了活命，或遇天灾人祸，事先就得挨拐借债；农民向地主借债的利率通常最低为月息三分，最高的有一角至三角；借粮利率一般是“冬三夏五”，即春借一斗，秋还一斗八升。利息的计算，大多是“复利”群众叫“利滚利”。如果到期交不清，就得利上加利，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八斗九年三十石”这种“驴打滚”的利率办法，不知残害了多少人的生命。

兴县名老中医张尊五

县志办公室 贾佩珍

张尊五，字子美。一八八六年四月五日出生于二区张家湾村一户普通劳动人民家庭。卒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享年八十二岁。是兴县一位名老中医。

张老先生自幼在本村私塾念书。十九岁（清光绪三十一年）进了秀才。辛亥革命后，在本县黑峪口任小学教员三年。其间遇母病，但在黑峪口周围仅有一名民间医生是王家塔的王丕模。张教员托人赶着毛驴去请王先生，谁知王先生不愿骑驴，未请到。于是又雇了一乘小轿才请来王先生。先生进家，稳坐中堂，张家连忙献白洋五元，以求急诊，然而王先生只抽烟不动手。当时一家人心焦如火，只好又加了两元白洋，才动手开了一个草药方，当日返回。结果病情未减，无奈，第二天又雇了小轿，二次登门请来了王先生，并加了十元白洋作为酬礼，这回王先生开了两个药方，但服后仍然疗效不良。在此情况下，黑峪口高小教师刘开文老先生主动出面治疗，张母的病才得以痊愈。

在当时，张尊五亲自两次请王先生的故事传遍了黑峪口周围大小村庄。由此激发了张尊五弃教学从医的决心，在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他毅然放下教科书，回家乡私人药铺当了徒工，每年赚身资（白洋）六十元。其实，以售药为名，暗中钻研药性、验方。年轻有志的张尊五目的明确，发奋学医，三年施治，五年出名。于一九一

九年（民国八年），由罗峪口的私商药铺请去，任坐堂医生一年，全年得工资（白洋）九十元。此后，张先生回到家里专门从事民间治疗工作二十余年。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在晋西北实验学校当医生。二年后被荣调兴县民众医院当了医生。由于张先生医德高尚、医术高明，深受广大人民的尊敬，蒙各界人士选为出席省、地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并在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各界人士学委会委员。又被提升为兴县中医部副院长。一九五六年与兴县人民医院合并，任中医师。在整风运动中，张老先生态度明朗，主动亮私。曾当众表示，要决心做一个“年纪一天比一天老，思想一天比一天新”的革命医务工作者，既要学习政治理论，又要钻研医学技术，同时要积极培养新生力量，把自己的技术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

张老先生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思想进步，事业心很强，热爱医务工作。虽年近八旬，工作却十分积极，年复一年、月复一月，不辞辛劳，坚持工作。因此，深得群众爱戴。曾被评为县医院的模范工作者，出席过专区模范卫生工作者会议，受到了荣誉和物质奖励。当时，不仅兴县有名，而且临近各县的群众也知道兴县有个名老中医——张尊五。

由于张老先生医术高明，对患者极端热忱，曾受原晋绥边区首长的邀请，先后到北京、上海出诊过三次，在华东军区医院也住过很长一段时间。一九五〇年他第一次到北京给中国民主妇联会秘书长亚苏同志治愈水鼓症。一九五二年给中央首长张稼夫同志和十三位中央首长的家属治愈各种疑难病症。当时武新宇同志对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尤香斋同志提出让张先生及其家属迁来北京居住，从事

中医治疗和医学研究工作。谁知张老先生所考虑的不是他个人的享受,而是山区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他谢绝了,他离不开革命老根据地,他没有忘记山区人民所受的少医缺药之苦,他牢记在旧社会有钱的治病、无钱的丧命的悲惨情景,他决心终生为山区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服务到底!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革命老根据地兴县。

一九五四年张老先生应邀到上海市“中国陆军大学”出诊,在日、苏、德三国名医面前显示了张老先生高明的中医技术和热忱的负责精神。受到军校领导的热情款待和优惠嘉奖。少将参谋陪同赴宴,中校副官保卫游览了名胜,中国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老先生亲自设宴款待等。所受之尊敬,使他再次深感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是医务工作者必具的美德。从而坚定了他为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和信心。

张老先生不仅精通内科,而且通晓外科、妇科,尤其擅长于杂病。对于肺病也很有研究。经他亲手治疗的病人,每天都有三十人之多。据李付院长的记忆,病情严重,而且复杂难治之症,如肠梗阻、水鼓症、肠痈症、噎症、疯症、肺痈、痛经病、白带症、血崩及小孩的急惊风等等,这些病大都古老顽固、久治不愈。有的病症特殊,在中医宝库里找不到治疗依据,然而张老先生能够大胆革新,根据多年来的治疗经验,科学的分析病情,对症下药,因而在中医治疗上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

一九六一年夏季的一天,一位姓奥的肠梗阻病患者在兴县人民医院就医,按西医大夫诊断非动手术不可,但必须要花四、五百元手术费,病情危急,时隔五分钟就有丧命的危险。但因患者家境贫寒、无钱手术。只好请来张老先生诊断,结果确属不完全肠梗阻,

用中医治疗法完全可以治愈。并当着西医大夫的面说：“两个钟头内丧命我负责”。说罢动笔开了两付草药方，当日服后患者大泄一场，病即痊愈。当时其家属犹如喜从天降，不知说啥才好。西医李大夫当即拜张老先生为师，并将此事呈报地区后受到奖励。更惊人的是给当时行署财政处处长黎化南同志治愈了食道癌。据查，在兴县共治愈了十三个癌症病患者。这是张老先生中医治疗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显示了张老先生高超的医疗技术水平。

张老先生不仅专门专人授艺，而且把他的医术普及到全县各地。五十年代末，曾担任初级卫校中医教员，认真细心地给年轻人讲解中医知识和传授五十余年的临床经验。经他亲手培养出来的年轻医生有贾克勤、康喜宽、马海牛等十九人。其中有不少已达到中级医疗水平。可称之为后起之秀。

为了表彰张老先生忠于人民医疗事业，给兴县医学界树立了榜样，继承祖国珍贵的医学遗产，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县卫生局与统战部共同筹办，由党政领导同志亲自参加的“张尊五先生行医五十周年庆祝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心人民医院的正副院长、医师、各科（室）的代表、各界人士代表、全县的名老中医、助产师、调剂员、模范卫生工作者以及张老先生的学生等共计百余入。

会议由县长温亮信同志亲自主持并讲了话，对张老先生高尚的医德和高明的医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高度的赞扬！并由兴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李怀茂同志介绍了张老先生的模范事迹。同时，张老先生介绍了他行医五十年来的经验总结。他深有体会地说：旧社会当医生的毫无政治地位，尤其是西医学说流入中国后，中医受

到歧视。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当医生的才有了光明的前途。我虽年老，但甘愿把晚年的一点力量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以为要当一个好医生必须具备“勤、慎、真、传”四个字，即学习要勤奋，诊断要谨慎，对人掏真心，技术传后人。这样才能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医疗卫生事业也就会兴旺发达起来”。

最后，由兴县中心人民医院外科医生高发祥同志代表医务界表示了决心，他把张老先生的精神和品质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启发大家学习：一心为医学事业贡献毕生精力，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高贵的事业心；精通祖国医学，攀登医学高峰，坚持不懈、刻苦钻研的上进心。

绥远《九、一九》起义回忆

高家村镇赵家川口村 赵连棠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是继北京和平解放后的一次光荣的义举，在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北京和平解放之后，毛主席英明果断地说，“有北京和平，就才能有绥远和平，”因之对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将军，鉴于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只有按照北京和平的方式才能寻求绥远的出路。从这时起解放军方面即经常派代表和董其武将军联系，商谈和平解决绥远的有关问题。而董其武将军，由于北京和平后错综复杂的绥远混乱情况，未便即时采取果断措施，和国民党的关系，还在藕断丝连，虚与委蛇。

绥远地区经过长期战乱的创伤，尚未得到休养身息，城市萧条农村破产。北京和平解放后补给中断，绥包至河套尚有两个军、一个骑兵师和两个骑兵旅，加上地方部队，约有将近十万人的兵力，董其武将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就地补给，维持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军民生活十分困苦，和平安定是共同的乞求。所以董其武将军的和平路线是深得人心的。

北京和平解放后整编部队准备南下，中下级军官不少人东归绥远投靠董其武将军，绥包至陕坝分设军官队，收容东归干部。我于1948年7月，由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华北总部工作，曾任干训团区队长，311师付连长，部队整编后东归绥远，参加了陕坝军管队，这是1949年春天的事记忆犹新。

1949年夏天，阎锡山当上了行政院长，曾派徐永昌去绥远联络董其武将军会谈地址就选在陕坝。那时绥西保安师驻扎陕坝，师长张副元和陕坝警备司令负责接待与会官员，我在保安师士官队任区队长，被派守护飞机场，在徐永昌到陕坝的先一日，前晋军七十一师旅长方克猷，乘专机到包头，把董其武主席，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和军长刘万春接至陕坝。他们下飞机后，休息片刻，即出来慰问在场官兵。抗战时期我曾在河套工作三年，提起董其武将军来，是十分熟悉的，但这次在陕坝是第一次见面。将军五十来岁年纪，中等身材，精神焕发，身着士兵服，还越待着抗战时期艰苦朴素的作风，将军平易近人，慈祥的面容，谦和的态度，使人一看就感到亲切。他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以后，就和士兵们坐在一起，抚摸着士兵们问长问短，士兵们感激的说：“董主席这样的大官，不辞劳苦来慰问我们，真是太荣幸了”。将军把在场官兵都慰问后，就和我们席地而坐，等待徐永昌的飞机到来，晌午时刻，兰州来电话，说徐永昌翌日到陕，张副元师长和于司令，才把将军等接回塞上新舍安息。（塞上新舍是抗争时期付长官在陕坝修建的宾馆）傍晚于司令命士官队选一排长带一班卫生守卫塞上新舍。队长选好人，命我带领前去，我为这样一位平易近人的长官担任临时警卫感到荣幸，欣然领命前去。晚间曾陪同董将军回家，探望老太夫人，次日清晨又到医院慰问了一些住院的人。我和董将军的遇会，虽然是短暂的两天，但他那淳朴正直的作风，谦和近人的态度，是我在外奔波十多年来，遇过不少的长官中少见的，因而董将军的为人，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日上午，徐永昌乘专机至陕坝，同来的还有空军副总司令